

การหยุดชะงักด้านการสื่อสารและงจรที่ขาดความสมดุล
การประกอบใหม่ทางความคิดของคนรุ่นใหม่ในมาเลียเซีย
กรณีศึกษา เหตุการณ์ความรุนแรง 13 พฤษภาคม 1969

แครอล วงศ์ เคอร์โร

คณะวารสารศาสตร์และสื่อสารมวลชน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หนานจิง หนานจิง เจียงซู สาธารณรัฐประชาชนจีน 210093

อีเมล: carolong@qq.com

รับบทความ: 20 มิถุนายน 2562 แก้ไขบทความ: 15 สิงหาคม 2562 ตอบรับบทความ: 17 กันยายน 2562

Communication Shock and Imbalance Spiral: A Study of May 13th and the Cognitive Reconstruct among New Generation in Malaysia

Carol Ong Ke Rou

Institute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Jiangsu, 210093, P.R. China

Email: carolong@qq.com

Received: 20th June 2019 Revised: 15th August 2019 Accepted: 17th September 2019

Abstract: Malaysia is a multicultural country where Malays and Chinese show a symbiotic state. However, 50 years ago, an ethnic conflict break the peaceful relationship between Malays and Chinese, which is the ethnic riots of May 13, 1997. May 13th incident caused the Malays and Chinese to be frightened and even caused cognitive bias between them. These two communities kept each other a safety distance, but today, the new generation reform a new ethnic relationship because of the social media. Interactive between Malays and Chinese is different from their grandparents. This study conduct depth interview among young generation of Malays and Chinese, and also the survivor of May 13, to explores their views on collective memory and the changes of ethnic relationship between old and new generation. The result shows that, May 13 fix into an “imbalance spiral” since government control media and audience “heard” those scary stories. However, this phenomenon broke due to new media and the selective exposure by audience. Besides, “communication shock” occurs when young generation receive message that against stereotype, where this bring the reconstructs of cognitive to other ethnic.

Keywords: Communication Shock; Imbalance Spiral; Ethnic Communication; Symbiosis Relationship

传播休克与失衡螺旋：马来西亚新生代族群交往的传播断层及其认知重构——以 5·13 族群暴动事件为例

王鈞媣¹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南京，江苏 210093，中国

电子邮件：carolong@qq.com

收稿日期：2019-06-20 修回日期：2019-08-15 接受日期：2019-09-17

摘要：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文化国家，各族之间和平共处，呈现一种共生状态，但要论最具代表性的族群冲突事件，非 1969 年 5 月 13 日的族群暴动莫属。5·13 事件今年进入了 50 周年，半个世纪前，5·13 事件令马来人与华人闻风丧胆，甚至造成彼此之间的认知偏见，让两族彼此保持安全距离，而半个世纪后的今天，80 后开始的新生代因新媒体崛起，互动场域转换到网络社会而不再被 5·13 事件的“恐惧心锚”所影响。本文以深度访谈的方式访问了马来西亚新生代马来人与华人，探索媒介化社会语境下，新的族群关系产生的变化。研究发现，历史记忆出现了传播断层，过去陷入“失衡的螺旋”的 5·13 事件因受众自选接触而得以打破，而新生代在获取有别于既定印象的观念时，也产生了短暂的文化休克现象，呈现出“传播休克”反应，即好奇有趣、焦虑疑惑、尝试了解、选择接受。这一过程重构了新生代的他族认知。

关键词：传播休克；失衡螺旋；马来西亚族群交往；513 事件

¹ [作者简介] 王鈞媣 (1989-)，女，马来西亚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大众传播与媒介管理，在读博士。

走在马来西亚的街头，问问任何一位当地人，你对马来人和华人的印象是什么？一般上，马来人会说，华人有钱但骄傲，而华人会认为，马来人善良但懒惰。这种既定印象是笔者身为土生土长的马来西亚华人从小听到大的论述。作为一个多元族群的国家，马来西亚属于多文化的社会结构，而族群问题一直是敏感而迫切的。历史上的族群关系分成四个阶段：首先是二战前英国殖民统治下，把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分而治之而刻意区隔了族群；接着是国家独立后，由于经济地位的不平等，而造成 1969 年 5 月 13 日非常严重的族群冲突；在 513 事件后，拉萨政府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帮助马来人改善经济地位；最后是马哈迪政府推行了新发展政策解除华人经商的限制，因而缓解了两族之间的矛盾。这四个阶段的族群关系一直是动荡而复杂的。马来人与华人之间的关系，既容易被政客煽动，也容易被媒体报道影响，进而挑起一系列的族群冲突事件。然而这一切在 10 年前，即 2008 年开始变得不一样，新媒体崛起导致马来西亚马来人与华人之间的族群关系起了微妙的变化，乃至去年 509 全国大选前后，新生代马来人与华人之间的族群交往已经产生了变化，不但影响了既定印象与认知偏见，也让族群关系经历了划时代变迁。本文以马来西亚最具代表性的族群冲突事件 5·13 为例，比较媒介化社会语境下新旧族群关系，并探索新媒体下新生代对族群认知的重构。

一、研究背景

（一）媒介化社会下的族群关系变迁

在 2008 年，马来西亚出现了一种新景象。80 后开始的新生代藉着新媒体渠道共同表达了政治诉求与社会关心，彼此不分族群而聚集到了一起。当时，反对党利用了面子书、推特等社交媒体，成功掀起了政治反风，导致中央政府在 3 月 8 号的全国大选中，失去了 5 个州属的统治权，这件事被称为

308 政治海嘯。10 年后，即 2018 年 5 月 9 日，马来西亚实现了有史以来第一次的政党轮替，反对党希望联盟成功入主布城，把执政了 60 年的国阵给赶下台。509 改朝换代的前后，马来人与华人之间的关系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新生代对于国族认同与族群身份有了新认知，这一切有赖于新媒体崛起，是媒介化社会导致族群关系产生巨大改变。新生代马来人与华人在网络社会因其缺场交往而衍生出一套新的族群交往模式。

（二）族群关系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马来西亚族群关系一直是东南亚研究的热门课题。在过去，大多数研究脉络注重在宏观视角下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课题为主，其后，人类学方法中微观视角的相关研究才逐渐获得重视。在海外华人研究领域方面，基本分为三个主流范式：其一，侨乡社会与文化研究，强调海外华人的文化属性，侧重侨乡情怀、宗亲社会关系、对民族文化的传承与转换，以及在居住国的文化适应与融合的相关研究¹；其二，海外华人网络与经济研究，重视华人的社会网络及其经济影响力，以及海外与中国的跨国经商研究等；其三，国际移民的困境与流动人口研究，从居住国法律与政策探讨华人的公民权益与生存问题、都市现代化的人口流动，以及移民二代的相关研究等²。陈志明教授曾

¹ 2013 年 12 月 8 日在广西民族大学举办的“海外华人与中国侨乡文化”国际研讨会上，国际学者讨论了四个主题的研究领域，包括：海外华侨华人与侨乡关系研究、侨乡文化研究、华侨华人社会与文化研究，以及国际移民、归难侨研究。其中有三位马来西亚学者在“华侨华人社会与文化研究”领域中发表了文章。参见：王森林：《“海外华人与中国侨乡文化”国际研讨会综述》，《八桂侨刊》[J]，2013 年 12 月第 4 期，第 77 页。

² 于 2012 年 11 月 19-20 日在五邑大学举行的第二届“国际移民与侨乡研究”国际学术会议上，有关“国际移民理论、政策、历史与现实问题”的议题探讨中，马来西亚理工大学学者 Diana Wong 以回族流动到马来西亚的案例，探讨了穆斯林流动性与中国新移民问题，她尤其强调宗教在回族穆斯林的流动决策和流动模式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由此提出了移民的侨乡流动模式与宗教流动模式。参见：刘进、姚婷：《比较视野下的国际移民与侨乡研究——第二届“国际移民与侨乡研究”国际学术会议综述》，《华侨华人历史研究》[J]，2012 年 12 月第 4 期，第 76 页。

提出族群关系的理论模式¹，此关系模式较全面展现了海外华人族群关系的概况，尤其历史沉淀的重要因素，但基于马来西亚特殊的多元社会结构中其族群关系是更为复杂而动态的，并且随着时代语境的改变，因此族群关系的变化必须从宏观视角与历史脉络出发，进一步探讨日常生活中的族际交往。

马来西亚族群关系研究的主要范式是宏观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以经济政策为主线，并运用历史梳理与历史比较为主要研究方法。由此看来，运用质化研究方法，结合微观视角探讨马来西亚族群关系将能开辟新的思路。同时不能忽略网络时代的时空概念，尤其线上线下不同的族际交往模式给子里本研究启发性思路。从历史的梳理可以发现，马来西亚的经济政策成为了族群误解的主因。为此，多方学者从历史脉络、政治与经济学的宏观视角来解析马来西亚的族群关系。然而，在 2008 年纳吉政府面临的 308 政治海啸却是一个分水岭。学者们没有对此作太多的系统探讨。如今，距离 2008 年已经 10 年过去，经历过 2018 年 5 月 9 日全国大选，有史以来第一次改朝换代，马来西亚的族群关系又因政局改变而产生了变化，其中，社交媒体也起着决定性作用。

简单来说，学者们对马来西亚族群关系研究的结论分两个阶段，20 世纪的研究认为，族群关系看似和谐，其实矛盾不断且非常脆弱，容易被煽动；但从 21 世纪研究来看，大部分学者认为，马来西亚的族群关系属于“共生状态”，各族群因利益与资源分配而形成了合作形式，甚至为了整体利益而

¹ 陈志明教授提出的交往模式包含六项要素：第一，族群关系可以用族群间的社会经济竞争本质加以解释；第二，政治因素对我们理解族群关系至为重要，尤其是种族性政治历程，即社会经济不平等及文化现象如何沿着族群路线动员，以及族群关系在政治竞争上如何被动员起来；第三，族群关系亦受可视为政治历程的部分而加以研究之思想所影响，即这些思想如何被动员以影响其他族群的地位和命运；第四，族群关系的研究应当注重阶级的因素在族群间的竞争和竞争的持续；第五，族群关系必须从历史的范畴去看，以便理解历史的发展如何影响今天的族群关系；第六，族群关系也必须从全球经济及国际政治的范畴去看。参见陈志明：《华裔与族群关系的研究——从若干族群的经济理论谈起》[A]，《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C]，第 69 期，1990 年。

暂缓族群的阶级利益（周星，1993）。因此，在政治层面，马来人与华人之间的族际关系表现为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

基于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以质化研究方法，深入民间探索马来人与华人之间的日常生活互动与网络社会交往，从中了解长者的交往模式与新媒体时代下，即媒介化社会语境下的族群互动及其共生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三个研究问题：第一，了解日常交往中，马来人与华人的族际接触、沟通、相处、交流的发生动机及其过程，尤其当上层利益集团建构的族群矛盾和冲突如何在日常生活族际交往得到消解与重构？第二，在媒介现代化下缺场交往中，新生代族群关系与上代族群关系有何层次和维度异同，尤其如今和平盛世下被温养的新生代对族群冲突的看法，及其族群认知因受到历史记忆不同的影响程度，将如何形塑新的族际交往模式？第三，在媒介现代化语境下代际差异的族群关系经历了变迁，关系变化中两代人的族际交往其异同显示出怎样的族际交往“平衡点”，以达到马来人与华人之间的族群“共生”状态？

二、研究方法

根据研究问题，本研究使用质化研究方法进行。笔者从 2016 年 10 月开始持续进行了为期两年半的田野调查，通过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等方法展开。调查过程中以吉隆坡的马来人与华人为研究对象，其重点从两族之间的相处交往出发，探讨其交往的深度与广度，同时辅之以不同阶层、不同年龄的访谈案例，从而更为全面地调查两族日常交往的规律。因此本研究将以多点民族志的方法进行深入访谈，围绕族际交往这一主题展开调查，并以滚雪球的方式寻找访谈者。这里提到的深度访谈法是质化研究中的无结构访谈方式，即一种半控制或无控制的访谈，其访谈基础是一组深度访谈的主题，而不是

标准化的问题。为了确保个案的典型性与普遍性，本研究将进行长达两年半的参与观察与多次的访谈与追问，而无结构访谈与参与观察的主题将围绕在 513 事件与族群线上线下的不同交往。考虑到研究目的，本文抽选出 5·13 事件幸存者吴振通、70 后的 KS、90 后华裔新生代小源，以及 00 后的马来少年 Ahmad 的为主要访谈对象，并从他们过去的切身经历与生活感受，代际之间不同的族群互动与沟通方式，进而窥探媒介化语境下两代族际交往的异同。

三、5·13 族群冲突事件

50 年前的 5 月 13 日，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发生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族群冲突事件。半个世纪过去了，作为最具代表性，也最有影响力的族群暴动事件，5·13 事件不仅仅揭示了是族群矛盾的本质，它同时也是马来西亚马来人与华人相处的缩影，更是一个族群文化差异的象征符号。5·13 本身代表的不只展示了族群关系从和谐走向冲突的具体过程，它更体现出传播媒介对族群关系的指标和催化作用。在 1969 年，那个只有传统媒体的年代，媒体的铺垫作用具有强大影响力，政府通过对媒体的限制和利用，成功引导受众对族群冲突事件的理解，以及对他族的认知偏差。50 年后的今天，新媒体崛起，受众也不再是 50 年前感受过“戒严”恐惧和愤怒的华人与马来人。新一代华人与马来人的相处模式已全然不同，这不只是媒体化社会语境下交往空间转变而导致族群交往出现了变化，它其实也象征随着媒介使用的变迁，历史事件引起的族群认知偏差也得以被重新教育。此外，因为 5·13 事件而推出的“新经济政策”，也因为 2018 年 5 月 9 日全国大选改朝换代，马来西亚实现第一次的政权轮替，打着民主旗号的希望联盟新政府，其经济部长阿兹敏表示要修改这个以特定族群利益为主的歧视性政策。50 年前后，同一项历史故事，同一项经济政策，其展现的族群矛盾与歧视得以缓解，改变了

族群交往的防线。马来人与华人之间仿佛有一道隐形的墙，阻碍了两族深入交往，笔者从小就耳濡目染，听到长辈常常会说，“**不要去挑战马来人的底线，不然 5.13 事件就会重演，很可怕的！我们会像印尼排华那样经历华人大屠杀！**”

马来西亚社会学者柯嘉逊在十年前点出了阴谋论，声称 5·13 事件是巫统新兴官僚资产阶级所精心策划的政变，而诸多学者也纷纷认同 5·13 事件并不单纯，比如黄进发认为当初引起 5·13 事件爆发的官方论述，即华人政党胜选在街上游行示威而触怒马来人的说法并不成立，这场“华人海啸”其实是“政治海啸”但却被上层政治精英和媒体可以蒙蔽了民众。来到今天，这件族群暴乱事件仍未真相大白，主要是因为时任国阵政府援引了《官方机密法令》导致国家档案和官方文件都无法被公开查阅，学者直至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依然无法获取相关数据和资料来进行相关研究。今年是 513 事件迈入 50 年的纪念，身为“5·13 系列活动工委会”主席的陈亚才透过媒体呼吁政府解除机密法令，让学者获得相关资料进行研究，并将 50 周年主题定为“解惑”，希望解除迷惑与困惑，解除这个事件曾经带给马来西亚人的阴影、恐惧、不安和狂妄。在 2019 年 5 月 11 日，星期六早上 9 点，陈亚才与 513 罹难者的家属、雪州高级行政议员邓章钦等上百人出席了位于雪兰莪州双溪毛糯 513 墓园举行的公祭仪式。主办方甚至邀请了六大宗教团体，包括伊斯兰教、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和兴都教的代表在现场进行宗教仪式。笔者所在的 Astro 中文新闻组也被邀请前往采访，《八点最热报》记者团队因此去了一趟墓园。结束公祭仪式后，513 事件幸存者，65 岁的吴振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讲述了当时年仅 15 岁的自己如何从 2 楼楼梯跳下来逃生的画面。

“50 年前的那个下午，5 点开始，因为我们要做生意的，平常很忙，但突然在 5 点之后没有人，整个市场都没人，奇怪今天什么事情哦，人都跑去哪里？隔壁村一名印度同胞就跑过来跟我父亲讲，uncle 你今天最好早点关店，等下会有事情发生。我当时是亲耳听到那个印度同胞这样跟我父亲讲的，因为我是在我父亲旁边，所以我很肯定他是这样跟我父亲讲的！于是我父亲就关店并收拾东西，其实通常我们是晚上 10 点才关门的，但那天就早关门了，关门之后就在店里吃饭。我们的店是铁门来的，门锁起来我们就在里面吃饭，然后 6 点多的时候，那些人（挑衅者）就开始丢东西。当时我们很怕，全都跑去楼上，当时店里面有二三十个人，因为那个店是租的，店主就住在楼上，所以我们全部就跑去楼上，过后他们（挑衅者）就放火烧（店），我们就大乱，因为浓烟滚滚，当时应该接近晚上 7 点了。我的一个外甥才刚满月，他母亲抱着他，他的哥哥啊一家人都很乱，我当时可以逃生，我就（从二楼）跳下来并躲在垄沟里。直到后来镇暴队来了，他说他是警察，我和姐姐就爬起来，然后他们就开始去就我们楼上那些人，用楼梯救他们下来，我们家就…牺牲了 8 个人…我是从二楼跳下来的，因为当时已经不会怕了，只有要逃的求生意念，他（挑衅者）来杀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动机，我们也不知道他要做什么，我们明明跟他无仇无恨的嘛，关键是那个动机，为什么要杀我们，我们一直以来也要求和平的嘛，为什么要这样？其实现在道歉也已经没有意义了，只是这一万八千两百五十天，我不能够忘记，很多长辈都叫我忘记，但是我不能够忘记，因为它就在脑海里面，每一天每一刻它就是在脑海里面没有办法忘记！不是 20 年而是 50 年，一万八千两百五十天，那个阴影还是在那边，那时候怎样（从二楼）跳下来，我还是历历在目！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把这个阴影埋在心里面，不知道要跟谁讲。”

吴振通的故事让人心酸，公祭仪式现场也有文化艺术工作者吉安透过麦克风朗诵诗歌，内容与 5·13 事件相关，旁边还有音乐人吹箫伴奏，气氛悲伤。公祭出席者多位罹难者家属，他们在墓碑上献花，甚至有出席者表示，他不知道自己的家人死在哪里，但看到有这个活动他就坚持出席一定要来看看。公祭仪式的出席者全都是华人，没有马来人，在这起事件中，华人自称是受害者的华人，是愤怒的马来人赶尽杀绝，对华人进行大规模屠杀，但在马来人的眼中却并非如此。小源是 90 后，他是少有跟马来人混得非常好的华人，从小在马来甘榜长大的他操得一口流利的马来语，而且还有马来人会大感亲切的地道口音。“我跟马来朋友之间没有什么禁忌的，513 事件也可以谈，但我很惊讶的是，他们的长辈说，513 事件是华人先开始挑事的！而我的长辈又告诉我，是马来人先来杀华人的！到底事情的真相是怎样，我也不知道。我是独中生，从小受华文教育，独中生就是别人眼中很华人主义的一群人，我本来也很讨厌马来人，但有一次，政府派了一位马来老师来独中，她告诉我们全班同学，513 事件不是一个禁忌，反而是应该被拿出来讨论的，而且华人也不应该是被谴责的一方，从此之后我就改观了。”诚然，80 后 90 后华人分为三种，一种是华人主义很重，从小没什么机会接触马来人的华人群体尤其是独中生（全中文教育的独立中学的学生），而笔者虽然在华文型国立中学求学，但平常也没什么马来朋友，我们这一类华人群体通常对马来人保持警惕、抵抗与认知偏差，认为马来人懒惰且不够聪明；第二种是在马来甘榜长大，在底层社会中与马来人有较多交往机会的华人社群，小源虽然是独中生，但因为从小在马来甘榜长大，较为熟悉马来人文化，能操一口流利马来语并愿意主动跟马来人交朋友；第三种则是上流精英社会中接受高等教育，以英文为日常用语，不重视中文作为母语的华人社群，华人主义者

会称之为 Banana，意思是外面黄皮肤，里面却是白色内涵的香蕉，这是华人社会用来嘲讽对方“身为华人却不懂中文”的歧视用词。

本文提及两个例子的用意，是为了比较老一辈的族群关系与新生代的族群交往。同样是 5·13 事件，但身为遇难者的吴振通和 90 后的小源就是两个典型个案。即便不是 5·13 事件的经历者，在 50 岁以上的受访者当中，大家对 513 事件都保持着愤怒、紧张、疑惑、悲伤的负面情绪，他们相信 513 事件是一场屠杀与权谋而华人无辜遭殃。至于 30 岁以上的受访者则是表现出不信任，他们不相信事情如官方所说的论述，甚至不相信长辈口诉的事实，因为他们认为，这些都是听回来的，是想象出来的白色恐怖，但政府成功了并以此控制族群关系来达到政治目的和相关利益。而 30 岁以下的 90 后 00 后，他们普遍不关心。按照小源的说法就是“**事不关己，即不劳心，513 事件关我们什么事？我们都经历过了啊，对我和马来朋友来说这甚至都不是什么禁忌或敏感话题，可以在大庭广众下高谈阔论，长辈很敏感可能是因为他们经历过吧，但现在时代不一样了，我们也不在乎什么 513 不 513 的。**”从小源的态度可以看得出来，面对马来西亚族群暴乱事件，新生代几乎是无感的！进行深度采访期间，笔者发现老一辈的族群互动和新生代的族际交往是截然不同的，而这当中媒介起到了关键作用，分别是新媒体的出现，以及传播的断层导致代际之间出现交往差异。

说回 513 事件，在电视台进行田野调查的笔者，另一个身份是新闻工作者，这段期间笔者发现，中文报馆基本上只会走个形式，报道过 513 公祭仪式或简单梳理 513 事件，仅此而已，但网络媒体《当今日大马》却做了中文、马来文和英文的三语系列报道。在第一篇文章“**5·13 暴乱：笼罩大马半个世纪的阴影**”中就梳理了当初 513 事件发生经过，并贴上了许多当时的报章截图，以及历史照片，包括反对党胜选后在街上游行的图片。另外，其他的

系列报道其文章标题包括“513 半世纪：我的故事”并分为五个故事来叙述，包括“我的故事 1：‘放开他们！杀我’的怒吼”、“我的故事 2：救人与抵上太阳穴的枪”、“我的故事 3：甘榜巴鲁的莫欣和金源”、“我的故事 4：他的手就这样被砍下”、“我的故事 5：若我都忘记，谁来记得？”同时也有“民调显示，多数人要理事课本纳入 513 事件”以及“如何走出黑暗史，迈向和解共生？”这些文章都用耸动而画面感强烈的字眼来作为标题，不难看出围绕 513 事件的关键词分别是暴力血腥、生死存亡、族群关系、一生伤痛与心理阴影。当中除了莫欣和金源的跨族群情谊是正面的，其余都充满着悲伤与痛苦。故事叙事手法强烈而触动人心，但又有多少人真的放在心里？有！但却是关注 513 事件的长辈居多。

四、新生代族群交往的传播断层

（一）传播休克：传播断层中新生代对历史记忆无感

泽利泽列下记忆侵蚀（cannibalization）的四个阶段（Zelizer, B., 2011），分别是淡化（minimalization）、替换（substitution）、取代（displacement）和灌输（transportation），并认为这个过程将导致记忆的不确定性，致使媒体曲解信息并颠倒黑白。政治介入历史事件是有迹可循的，官方数据模糊了死伤人数，传统媒体淡化了受害者的心情写照与真实的血腥暴力，然后利益集团因政治目的再以族群冲会造成国家不安宁为理由，成立了国家行动安全理事会。替换了记忆后再以新的记忆碎片来取代，以维护族群和谐与国民团结为由实施“新经济政策”并灌输给下一代。而口传的版本就绘声绘影得多，华人长者大多淡化了华裔凶徒进入戏院杀马来人的部分，重点强调马来人烧店，在华人杂货店纵火的事迹，还将这段故事都讲给儿子和孙子听。马来人长者也一样，“**从小我父母就告诉我，是华人先挑衅，**

马来人为了保护自己才反抗的，但是当小源跟我说，他父母告诉他，是马来人先胡乱杀人时，我真的很意外也很惊讶！后来就想，那当然啊，谁会说自己错呢？肯定都是对方错！所以我可以理解小源听到的故事版本，可是你也不能否认我听到的版本，你无法证明我的是错的，你的才是对的！可是我还是很好奇，所以就一直问问题，问了小源很多问题，他也很耐心的跟我解答，过程中也反问我为什么这个为什么那个。接着我…我后来倒是蛮能接受的，哈哈哈！嗯，就觉得虽然听到的版本不同，但或许都是事情的片面，我们就把这个拼图拼起来，那大概就是真相的全貌的。最后我已经不再纠结，毕竟 513 也不怎么管我的事，现在我们（马来人与华人）私下相处都挺好的呀，没什么话题不能聊，没什么禁忌不能碰触，小源是个好人，我们是好朋友！”Ahmad 是典型的 00 后新马来人，思想开放，为人也开朗健谈。有趣的是，他描述自己获知 5·13 事件有不同故事版本的过程，进入了类似“文化休克”¹四种阶段的表现，分别是蜜月期、过渡期、调整期与融入期，最后进入文化适应。跟文化休克的长时间适应过程有所不同的是，Ahmad 是在短时间內经历了四种反应，即好奇有趣、焦虑疑惑、尝试了解、选择接受。诚然 Ahmad 是受到了文化冲击，也是一种文化震惊，在英文 Cultural Shock 的 Shock 是休克与震惊的双关语。Ahmad 在受到文化冲击后的四种反应对照文化休克四种阶段近乎雷同，但时间更短，适应能力更强，接受度也更高。他先是對同一时间的不同理解感到有趣，这个蜜月期让他对 5·13 事件的不同故事版本产生好奇，但追问之下发现很多认知上的偏差，这让 Ahmad 感到焦虑不安，接着就摆出不信任的姿态表示质疑，可是在跟小源讨论的过程中他

¹ 文化休克 (Cultural Shock) 是 1958 年由美国人类学家 Kalervo Oberg 提出的一个概念，指当一个人进入不熟悉的文化环境时，会因失去自己熟悉的所有社会交流的符号与手段而产生迷失、疑惑、排斥甚至恐惧的感觉，泛指一个人处于一种社会性隔离，而产生焦虑与抑郁的心理状态。

又重新调整了状态，找到一套方法来说服自己“不同版本也可以被理解的，因为大家都会过错归咎在他人身上”，最后他选择接受，并认为“哦我知道了，就这这样吧，反正也不影响我跟小源的交往相处，我们仍是好兄弟”。这个过程可能维持几天乃至几周，甚至可以短至你在麦当劳吃汉堡的一个下午就能全都经历一遍。这跟如今的媒介化社会语境的速食与碎片化、新媒体下的个人主义等特性有关。但除了表现出文化休克的反应，最大的问题还在于传播的断层与新生代的无感，这才是一种“传播休克”。

前面提及的《当人大马》5·13 事件系列报道，其新闻链接在面子书上一度流行开来，但很快就被淹没，很多人是为了转发而转发。新闻组里的 Patrick 原本的本科专业是会计师，但毕业后毅然加入新闻组，他说，自己从三年级开始就看报纸了，对新闻非常热爱，“转发 5·13 事件的新闻帖我觉得很有意义啊，年轻人就应该多了解并且懂得这件族群暴乱事件。为什么我们现在族群会冲突，就是因为彼此不了解！”然而，像 Patrick 那样常常看报纸，主动了解时事的年轻人并不多，受访者当中几乎所有 90 后 00 后都没有兴趣。采访期间，笔者发现新生代分成两类，一种是完全没兴趣，不会转发，就是一副“哦，5·13 事件啊，我知道，so? 虽然我懂这段历史很重要，但我没什么兴趣想知道，知道与否都不影响我的生活”，另一种则是像 Roy 那样，“哦我觉得 513 事件是很应该被正视的，虽然我没有经历过，但转发了呀，我看过这则新闻的内容，我转发之后就会让其他朋友看见”，Roy 的语气是平静中带点兴奋和自豪，但我忍不住再问，其实你没把文章完整看完吧？转发会不会是因为这样做能显得自己有文化、比较高尚？Roy 马上否认，“没有啦！我当然有看完好不好”，但从表情与肢体动作上，我已经得到答案。

事实上，95 后和 00 后等新生代普遍上并不关心 5·13 事件。他们没经历过 5·13，即便了解过，除了觉得自己族群“受欺负”而感到愤慨之外，并无太多感觉。而 80 后 90 后诸如笔者，从小听长辈提起过，并对 5·13 事件有了先入为主的认知偏见，认定是马来人杀华人，而马来人也同样认为是华人先挑衅。媒介记忆最可怕的地方在于，真相并不重要，人们只愿意相信自己想知道的真相。老一辈以“亲眼看见”和“听回来”而想象这段历史事件，卡在中间的 70 后 80 后 90 后则是从长辈口中知道了 5·13 事件，多少有着一些族群内部的悲壮情绪，但来到 95 后 00 后等新生代，5·13 事件已经不是他们关注的焦点。小源说到“**我们真的不关心，知道了又怎么样呢？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有趣和好玩，你看我们玩最多的是 Instagram 和面子书，旅行美食美女奢侈品，这些生活品味才是我们热爱的。513 太沉重了，**并非我们不关心族群啊，只是我们的生活态度就是要轻松一点啊，fun 一点，**我们比较关心个人。**”另一位从事新闻行业已经超过 40 年，在组里我们都称之为“老板”的 Q 先生就跟我说过很有意思的一句话，“**以前我们会说有国才有家，有家才有我，那时候搞革命，全副身家都寄回去中国给家人或资助改革事业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我们都把生死置之度外，国家才是最重要的！**但你看看现在的年轻人，都在搞个人主义，只关心自己的照片获得多少个赞、多少个转发，谁还来这一套有国才有家？当然现在时代不同了，他们没有经历过战争，不懂什么是家破人亡、颠沛流离，他们是幸福而安稳的一代，我很欣慰，可是这也让他们不再关心国家和族群大事。”社会变迁，新媒体崛起，新生的交往场域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我们会区分日常与网络社会的双重身份，但对新生代来说，网络社会就是真实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缺场交往就是日常互动。老一辈的族群关系与新生代的族群交往俨然不同，从集

体主义走向个人主义，从双重身份变成多重身份同存共生，媒介环境的转变影响着马来西亚族群关系。

除了媒介场域转变促使交往空间不同而形成新旧两种族群交往，在上述的历史事件 5·13 族群暴乱中可以发现，历史记忆的传播过程已经出现断裂，50 年前因政治介入，传统媒体不被允许报道，只能靠人际传播的口耳相传，营造“听回来”的“想象的”族群冲突。这 50 年来，5·13 是个禁忌数字，是个敏感话题，就像《哈利波特》里的伏地魔只能用“他”来形容，不能说出名字一样忌讳。这种散播恐惧的“心锚”是政治利益集团的手段，但更诡异的是，这也是族群之间维持和睦共处的相处之道，马来人和华人会下意识的、有默契的保持“安全距离”。50 年后，学校历史课本依然绝口不提 5·13 事件。新媒体崛起，跳脱政府监管“圆形监狱”的网络世界是一片言论自由的新天地，加上近十年来民主和公民意识逐渐抬头，这时“失衡的螺旋”出现了，网络报道自觉做了 513 事件系列报道，而且还是三语版本，试图打破语言障碍让各族人民了解这段历史。然而万万没想到，他们的初衷却也是最大的困境，媒体想让新生代了解 513 这段历史，但显然 90 后 00 后 10 后都兴致缺缺，他们除了有趣和好玩之外，对族群历史不感兴趣，对文化认同与族群身份的建构已经有别于上一代。新旧族群关系之间像是出现了断层，或者说，历史事件的媒介记忆产生了“传播的断层”，新生代一方面不再受到“利益集团建构的族群关系”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他们同时发展出属于网络世界中的族群缺场交往，他们更专注于生活文化而非历史记忆。新生代的族群身份也很难用历史记忆来建构，他们对国族身份有着较强烈的认同感，更愿意宣扬自己是“马来西亚人”而非“马来人”或“华人”。笔者根据访谈资料并借鉴了文化休克，归纳出“传播休克”概念，这种现象主要是媒介化语境造成历史记忆的传播断层，而当个体获取与认知中不符的信息

时会产生四种反应，即好奇有趣、焦虑生疑、尝试了解和选择接受，这个过程是快速而短暂的，最后个体即便收到了文化冲击也表现出丝毫不甚在意的表现，对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依然保持最初的态度。

（二）失衡螺旋：自选接触陷失衡漩涡及其平衡报道

半个世纪前后的 513 事件还有一个有趣现象，即媒介场域转变后新旧传播方式及其对族群关系造成的影响。政治传播学当中有个仍在研究中的理论学说是对照“沉默的螺旋”的，即“失衡的螺旋”（spiral of imbalance）（赵心树、冯继峰，2017, 494），这个理论假设民主制度需要平衡的信息，然而平衡传播的理想状态并非常态，反而因为诸多原因造成了结构性失衡，比如利益集团利用媒体作为传播意识形态的工具，企图借偏颇报道影响民众，造成群体内信息流的失衡。另一方面，弱势群体也会以受害者身份自居并以传播作为“弱者的武器”，同时媒体也可能对特定群体，比如边缘群体不了解或又偏见而造成传播内容失衡。失衡的内容可以区分为议题的选择、报道的对象、事实的选择以及评论的选择。传播系统是动态且周而复始的复杂系统，不但在某个时间点上对某个单元的失衡，甚至还会造成另一个单元在下一个时间点的失衡，如此无限循环，形成“失衡的螺旋”。失衡螺旋有两个内涵，其一是顾名思义，失衡报道后继续无限循环，最后真相已经不重要，人们陷入漩涡里，只愿意相信自己所相信的，5·13 事件正是如此！其二是学者假设民主制度需要平衡，正因为受众无法自己筛选信息，所以现今社会的媒体更有责任精心挑选，为人民提供简短的、真实的、高质量的、易于理解的、平衡的信息（赵心树，2012），赵心树还将这个平衡制度，即由法律规章和道德规范构成的行为规范，称为游戏规则，并认为规则中一个关键的法律规定就是言论自由。

网络媒体《当今日马》做了一系列的 5·13 事件报道，企图要打破平衡。然而问题来了，即便网络社会的言论自由度增加，但在网络传播中，网民选择信息和信息渠道的能力和意愿大大强于传播媒体的受众，这种自选接触（selective exposure）（Jang, S. M., 2013）效应加强了失衡的螺旋。人们沉浸并深陷在自己所愿意看到和相信的片面事实。“沉默的螺旋”是传播学经典理论，“失衡的螺旋”可视为是沉默的螺旋的一个极大扩展，反过来说，沉默的螺旋可算是失衡螺旋一个极小的特例。50 年前，5·13 事件遭到失衡报道，展开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失衡螺旋”；50 年后，沉浸了半个世纪的 5·13 事件开始被检视，在媒介化语境和民主进程提升赋予言论自由开放条件下，民众更有接触真相的可能。自选接触是一把双刃剑，首先，无论 5·13 事件的新闻报道在当时失衡多么严重，但人民还是通过直接经验和人际传播部分了解到事情并非如此，这就像是起了一道牵制作用的保险闸，不管政治人物多么努力煽动和渲染种族情绪，但最后还是因为民众想了解真相而打破了禁忌，逃出“失衡的螺旋”，人民从社会经验以及前辈的口中得知 513 只是听来的族群清洗，随着时间流逝，5·13 所带来的恐惧也慢慢被冲淡。40 多岁的 KS 没有经历过 5.13 族群暴动，他出生在事件发生后的几年，而他从小长大的地方是马来人占了 76.22% 的吉打，“**我是个很好奇的人，搬来吉隆坡都几十年咯，当初还特地去 Chow Kit 闲逛，然后在茶餐室看到那些 uncle 我就跟他们闲聊啊，交谈过程中我就发现到，咦，怎么大家都是听说的，他们跟你讲到天花乱坠，anzua anzua**（福建话‘怎样怎样’意思是讲得生动且夸张，仿佛身入其境），**其实都是听来的”。**

笔者后来再访问了一对 60 岁的华裔老夫妇，他们来自雪兰莪州马来乡村，“**哇当时真的很恐怖，吉隆坡那边，马来人一看到华人就杀，我的二弟那时候就是躲在杂货店，肚子饿也不敢跑出去吃东西，足足一个礼拜都是**

糖果陪白开水，他还说啊，华人一探头试图在窗口张望，马来人就会乱枪扫射！”听到阿姨这么说，我忍不住问，哦是二弟听到的吗？阿姨急忙否认并提高声调，“没有没有！是他亲眼看到的，然后他告诉我的！”几乎没有例外，所有受访者口中所谓的恐怖屠杀画面，都是“听回来的”，那些暴力和血腥也都是“想象出来的”，但在当时，这些听来的恐怖杀人事件，让华人连上街都不敢，甚至探出窗口的勇气都没有，华人言行举止受到了强烈的镇压恐吓。比起第一代经历过 5·13 事件的长者，第二第三代即 70 后 80 后 90 后会以更全面和批判的角度去质疑 5·13 事件“听回来的、想象出来的”白色恐怖。马来西亚在 2018 年 5 月 9 日经历了改朝换代，国家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政党轮替，是民主进程的一次大跃进。作为最能代表马来人和华人族群冲突，且是两族禁忌话题的 513 事件，在 50 年后的今天不再那么禁忌和“不可说”，变天后媒体也能报道 513 事件了，而且不受限的网络媒体甚至做起了专题报道。

但与此同时，自选接触会因个体的背景和族群身份与文化认同而产生选择偏向，就像《当今大马》遭受到批评与攻击，从民众的两极化反应中可以发现部分人士仍质疑报道不中立，选择相信他们想知道的，认为报馆做出了偏颇报道。在 2019 年 5 月 16 日，网络媒体《当今大马》发表了一段声明，表示 5·13 专题报道同时收获了赞许和批评声音，有人称赞媒体有揭开禁忌课题的勇气，但也有人认为报道偏颇并误导了民众，甚至恶意流传做专题报道的记者的照片。《当今大马》强调，他们制作 5·13 专题的动机是因为今年适逢 50 周年，并认为回顾历史的文章是必要的，社会不能避而不谈这段历史，反而应该怀疑真相补充这份空缺。同时，他们也希望年轻时代还有机会认识这段历史，以史为鉴，避免重蹈覆辙，甚至还有特别点到，为了尽量避免种族偏激，报社也确保这个专题小组的成员是来自于不同族群的，并且

提到，年轻一代虽然没有亲身经历这段历史，甚至缺乏了解，但却同样承担着历史的沉重，这个专题所设定的目标群体是马来西亚的年轻人，其专题小组多数成员也都不到 35 岁。至于被读者质疑报道中为何没有特定族群受害或事受挑衅的事情没有纳入其中，这份声明提出了例子，他们在专题页面讲到了手持武器的华裔暴徒闯入戏院杀害马来人，点出华裔挑衅马来社群触发 5·13 冲突，但与此同时，报道也记载目击者形容华裔住家被纵火，以及暴徒杀害两名乘车经过的华裔男子等等，甚至标记这件事记载于国家行动理事会的报告。为什么专题系列报道不但没引起新生代的共鸣，就连老一辈都不认同？如果说议程设置是传播者的心理，那么框架理论就是接受者的认知，受众往往会将自己已有的认知、价值观和世界观用于处理新闻讯息。新闻媒体有过选择或排除，以及强调或轻描淡写来突出社会事件的某一方面，促使手中激活记忆中的响应基模（schema）以作为判断依据，让受众对事件的理解趋同于新闻报道对该事件的诠释（Price V. & Tewksbury, D., 1997），当新闻中隐藏的框架与受众记忆中的基模越吻合，两者间的相适就越高，框架效应越大。但相反的，如果是一件某群体相信已久的历史事件，当媒体报道不符合预期也不符合历史记忆时，受众会产生抗拒心理，这也是一种自选接触。

综上所述，5·13 事件是马来人与华人冲突的起点，也是最有代表性的族群冲突事件。普遍相信，5·13 事件死伤人数超越官方数据，并认为当时的政府和传统媒体企图掩盖事情真相。基于媒体受制于政府，5·13 事件传播渠道改为口耳相传，并因此造成“听回来”的想象中的族群清洗，老一辈人对此耿耿于怀，并在今年 50 周年进行公祭仪式，非政府组织和学者纷纷呼吁政府解除《机密法令》让相关 5·13 得以公开查阅，还原事实。以 5·13 事件为例，媒介化社会对历史记忆冲击很大，致使新生代难以对历史

事件产生共鸣，继而建立文化身份认同。事实上，老一辈与新生代对于 513 事件有着不同的阐释与感受，长者遍布悲情意识，希望能得到一个答案，而新生代除了因父母对选择性传播而产生认知偏差之外，他们被告知有别于既定印象的事情真相时，还会表现出“传播休克”，短时间内经历四种反应，从好奇有趣，到抗拒生疑，再到试图了解，最后接受并表现出对历史事件与文化认同的无所谓。5·13 事件至今已经历半个世纪，50 年前因利益集团控制传统媒体而产生失衡报道，这个“失衡螺旋”维持了 50 年，如今网络社会言论自由开放而出现了“平衡报道”的反机制，但同时也因为自选接触而让受众产生了选择性了解报道并再次陷入“失衡螺旋”。

五、进一步讨论

本研究的问题意识源自于 2008 年 3 月 8 日全国大选后族群关系的变化，事实上，2018 年的马来西亚变天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 2008 年“政治海啸”打下了基础，最后成功实现政党轮替，严格来说，这是一场长达十年的民主革命，同时媒介化社会更在当中起到了催化作用。回顾历史，马来西亚马来人与华人的族群关系就是一部权力争夺史，族群政治因权力博弈而产生，基本上不可能逃脱权力的牢笼，马来西亚也绝无可能挣脱族群政治的治理方式。然而，媒介化社会席卷全球并将改变马来西亚社会结构，当新生代把网络社会的缺场交往当成日常实践，成为每个人生活的一部分时，网络空间的族群关系不再片面和虚拟，也让原本中央集权化的族群关系因为传播的断层而出现权力去中心化的可能。马来西亚的族群政治根深蒂固，要连根拔起让它消失根本不可能，但网络社会空间的时空因素却能打破，因为网络上的权力斗争呈现出不同的形式，政府不再是单向传播，其时空延伸允许族

群认知上做出纠正与再建构，同时时空压缩也来进了族群关系，即便是碎片化交往但至少马来人与华人更容易接触彼此，互动程度也变得更频密。

今年 2019 年，5·13 族群暴动事件迈入 50 周年，非政府组织与网络媒体大肆宣传 5·13 事件并不可怕，企图让民众拜托这件事带来的“恐惧心锚”，这也是安全线的牵制机制，老一辈的华人仍不敢逾越，50 岁以上的受访者每每谈及 5·13 事件都依然表现愤慨与生气，大骂 5·13 事件是场阴谋论，华人说是马来人胡乱屠杀，马来人说是华人先开始才发生族群冲突，而 30 岁以下的受访者则是表现出不在乎。传播学中有个经典理论是沉默的螺旋，但与此对照的“失衡的螺旋”（spiral of imbalance）强调，民主制度需要平衡的信息。赵心树将这个制度，即由法律规章和道德规范构成的行为规范，称为游戏规则，并认为规则中一个关键的法律规定就是言论自由。在马来西亚族群关系中，言论自由被限制了，传统媒体也被政府掌控在手上，但自从 2008 年的大选开始，社交媒体被广泛使用，言论自由相对开放。失衡的内容基本上分为三种，即议题的选择、报道的对象以及事实的选择，而失衡的螺旋理论主张，传播系统是一个动态并且周而复始的复杂系统，某个时间点上的某个单元的失衡会造成另一个单元的失衡并无限循环。除了自由度增加，有学者也认为，在网络传播中，网民选择信息和信息渠道的能力和意愿大大强于传播媒体的受众，这种自选接触（selective exposure）效应加强了失衡的螺旋。安全线的根本性包含了媒体刻意建构的受众情绪设置，但安全线是复杂而流动的，当媒介空间转变到网络社会，受众的自由度增加造成了自主性更高的自选接触造，让沉默的螺线走向失衡的螺旋。失衡的螺线就是安全线的一道牵制机制，能将走向极端的事拉回到正轨，重新检视，让族群关系达到共生共存。

从 5·13 事件的传播过程来看，50 年前，政府限制媒体刊登相关新闻，但却以人际传播的方式让受众“听到”很多恐怖谣言并产生想象中的恐惧心锚。50 年后，网络媒体《当今日马》为 513 事件做了系列报道收获褒贬不一的评价，非政府组织也隔空向政府喊话，要求解除《机密法令》让政府机密文件得以晒在阳光下，让学者研究 513 事件。然而，效应不大，在面子书上分享新闻链接的是第三代华人与马来人，即 80 后 90 后，但新生代尤其 00 后等受众根本表现得事不关己，这中间出现了传播的断层。当第三代跟第四代新生代进行日常族群交往，并谈及敏感和族群与宗教课题时，最常被谈论到的是华文教育、伊斯兰教议题和 5·13 事件。采访小源时笔者印象深刻，他是少数能跟马来人玩得很开的华人。他说，当纳吉担任首相期间给独立中学捐过钱，当时马来朋友以为政府一直都资助华文教育，只是以前媒体没报道，并且好奇，政府都这么仁至义尽了为什么华人还不满足呢？小源向马来朋友解释，说独立中学都是靠着华社自己出钱出力才能生存的，那次政府拨款是唯一一次，这让马来朋友万分震惊，一开始不太能接受，向小源问东问西，后来明白以后慢慢适应，并恍然大悟，愿意理解为什么华人坚持华文教育且对政府教育政策表现出强烈的不满与反抗。

由此可见，马来人与华人之间出现了传播的断层，两族因传播渠道的选择，比如各族会选择母语媒体为主要接受信息的管道而对他族产生认知偏见，即便网络社会更具备自选接触的自由，但仍出现族群性的选择偏向，而当双方在日常交流中就统一议题展开讨论并因此斩获新的、完全不同于认知的信息时，会表现出类似文化休克的过程：惊讶、不接受、努力接触，最后适应了这个文化差异的观念。本文认为，这是一种“传播休克”，因为传播断层而产生的文化休克反应。明明生活在同一社会空间，同属一样的社会结构，但却因为传播过程中符号上时间的延与空间的异，其符号能指的任意性促成

“漂浮的能指”，并因此出现族群间的传播断层，比如语言上的不同而翻译失误或媒体选择性报道，马来人和华人就这样出现了误会和矛盾，族群情绪遭煽动，导向了族群冲突。

六、结语

综上所述，马来西亚族群关系因媒介化社会而产生了变化，甚至可以说在马来西亚独特的语境下，媒介即关系。老一辈马来人与华人因为曾经历 5·13 族群暴乱事件而产生了刻板印象，对异族产生强烈的抗拒感与距离感，就像中间隔着一道安全线，但这种看似客气实则警惕的关系在 21 世纪因新媒体崛起而发生了巨大变化。80 后开始的新生代从日常互动，转而向网络社会进行缺场交往。然而因为传播的断层，导致新生代在接受有别于以往认知偏差的观念时，出现短暂的文化休克，即“传播休克”。另外，以 5·13 族群冲突事件为例，这个曾经陷入“失衡的螺旋”的白色恐怖，都是“听回来的”，在当时政府限制了媒体，而民间口耳相传的情况下营造出来的“族群清洗”恐惧感，导致华人不敢随便挑起马来人的神经，而马来人也会跟华人保持安全距离。事隔 50 年，这个“失衡的螺旋”被打破了，网络社会的时空属性以及受众的自选接触，让受众开始质疑事件的真实性。然而却也因为受众的情绪设置于自选接触，所以即便网络媒体做出一系列的 5·13 事件报道仍会备受质疑。马来西亚族群间是一种共生关系，但这种共生状态在新媒体出现后产生了代际间不同的族群交往。总的来说，历史记忆出现了传播断层，过去历史事件所产生的失衡螺旋在半个世纪后因自选接触而得以打破，但也因自选接触，新生代身上出现的短暂文化休克得以迅速修补，成为一种“传播休克”。

参考文献

- 王森林：《“海外华人与中国侨乡文化”国际研讨会综述》，《八桂侨刊》[J]，2013年12月第4期，第77页。
- 刘进、姚婷：《比较视野下的国际移民与侨乡研究——第二届“国际移民与侨乡研究”国际学术会议综述》，《华侨华人历史研究》[J]，2012年12月第4期，第76页。
- 陈志明：《华裔与族群关系的研究——从若干族群的经济理论谈起》[A]，《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C]，第69期，1990年。
- 周星：《民族政治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 赵心树、冯继峰：《政治传播研究的新发展》[A]，载于洪浚浩主编，《传播学新趋势》[C]，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11月第一版，第494页。
- 赵心树：《失衡螺旋与国际形象》[A]，载于苏力、陈春声主编：《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8月版，第407-412页；赵心树：《中国奥运传播中的“失衡螺旋”与中华民族“成长的烦恼”》[N]，载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2012年上载。
- Zelizer, B. (2011). Cannibalizing memory in the global flow of news. In On media memory: Collective memory in a new media age. [M] Palgrave Macmillan.
- Jang, S. M. (2013). Seeking congruency or incongruency Online? Examining selective exposure to four controversial science issue. *Science Communication* [J], Doi:10.1177 / 1075547013502733.

Price V. & Tewksbury, D. (1997). News values and public opinion: A theoretical account of media priming and framing [J]. In G. A. Barett & F. J. Boster (eds.), *Progress in communication sciences: Advances in persuasion*, 13: 173–212. Greenwich, CT: Ablex.